

建議与批評

为加强中国近代史的科学研究工作进一言

——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問題討論說起

邓 春 陽

中国近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已經进行二年多了。这个問題的討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的进展。但照目前討論的情况看来,还有不足的地方,主要是关于划分时期的标准問題特别是直接关系到分期問題的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还没有深入的討論。中国近代史上有許多問題是很复杂的,如果我們深入地加以探索,将会發現不少新的問題,并引起新的爭論,从而也会推波助瀾,帮助分期問題討論本身的深入。

我国学术界目前对中国近代史的科学研究工作还很薄弱。在“历史研究”以及其他学术刊物上,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論文比起中国古代史和中古史来只占很小的比重。我們看到,在討論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問題的时候,不但有对分期标准和中国奴隶社会的上下限,中国封建社会何时开始等問題提出具体意見的論文,同时还有不少从各个角度專門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些重大問題的論文,这样的論文对于分期問題的討論極有帮助。关于近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同样也应该如此。但在近代史方面,除了分期問題本身外,几乎就没有对別的問題的討論。

例如,在中国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中,对于1834年以后一段时期究应以1894(或1895)年抑或1900(或1901)年作为下限,1895以后是否在1905年划分段落,是否把辛亥革命作为划分时期的断限等問題,意見很不一致。然而在这里却包含着一些重大的問題,例如对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同盟会成立、辛亥革命等事件在其划时期的

意义上究应如何评价,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到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發展变化等等。如果对这些問題不加以深入研究,那么在1864年以后具体划分时期問題上我們就只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划分办法,而無法进一步把分歧意見逐漸集中起来,并且最后取得比較一致的看法。

誠然,上举甲午战争等事件都被承認为具有划时期的意义,但是究应把那一个事件提高成为具体划分时期的断限,則有待于对这些事件的深入研究和分析。令人遺憾的是,像辛亥革命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我們还没有做出滿意的研究結果来。为什么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以至甲午战争可以做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断限,而辛亥革命就不可以呢?有人說:“辛亥革命的意义当然是很巨大的,但它畢竟只改变了政体,而没有使阶级关系發生重大的变化。”(李新:“关于近代史分期的建議”,“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八、九期合刊)假如我們深入研究了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的意义,研究了辛亥革命以前和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經濟和思想方面的深刻变化之后,可能不一定得出这样的結論。我們的近代史研究者常常只滿足于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質等一般的論点,因而使得辛亥革命在其划时期的意义上不能得到应有的深刻的闡明。

正确划分历史时期不但取决于对辛亥革命这一类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深入研究,也取决于对近代史上各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間的“間歇”时期的研究。我們的研究者对这些“間歇”时期的社会經濟

狀況、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阶级关系的变化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是太淡薄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已经开始了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巨大的研究工作，可以稍稍弥补一下这个缺陷，但是除了经济史外，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也是空白。这对于分期问题的讨论更为不便。例如，戴逸同志在他的讨论文章（见“历史研究”，1956年第六期）中把反教会斗争作为1873—1901这一历史时期“人民力量的主要表现”，我认为这是由于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还缺乏研究的缘故。它使作者只看到反教会斗争这一个方面。

事实上，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农民运动虽然经历了一个低潮，但是仍然不断有小规模的起义和各种形式的斗争，并且主要是反封建性质的斗争。大约从1891年开始，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又逐渐转入高潮，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以后，斗争即迅速呈现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来所未有的高涨形势，并且反封建斗争同反帝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而斗争的锋芒则主要指向帝国主义。义和团运动正是九十年代开始以来特别是甲午战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的高潮的极峰。戴逸同志把义和团运动仅仅认为是反教会斗争的汇集和继续，实际上便抹杀了九十年代高涨的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只就甲午战后几年间来说：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侵略，在山东半岛、在旅大和金州、在深圳和九龙、在广州湾及其附近地区、在云南、在厦门和上海，发生了反对德、俄、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这些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同全国各地的反教会斗争一起，很明显地形成一个群众性的反帝运动的高潮（这类斗争在一些地区并直接发展为义和团运动）。在这几年中，还有一些重大事件。例如，从1895年开始的鲁西南、苏北、豫东一带的大刀会起义，1898年广西人民的起义，同年安徽渦陽数万饥民的起义。此外，长江中游各省会党所组织的起义也很多，东北各种流民武装非常活跃。至于较小规模的起义以及各地抗粮、抗捐、抗租等各种形式的斗争更是层出不穷。饥民抢米事件是普遍的现象。同时各少数民族反封建的起义也很高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895—1896年甘肃、

青海的回民起义（新疆方面也有响应）。从这些简单情况看来，显然是很难以反教会斗争作为人民力量的主要表现，而义和团运动岂不是上述这些运动的汇集和继续？

这一个问题自然也有待于讨论和研究。但是，戴逸同志对这些震动全国的事件一无提及，而又单单提到余栋臣起义，显然是由于这些事件及其所造成的形势未被注意到的缘故。这一个例子不是反映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很薄弱吗？我们对分期问题的讨论如果连这类的问题都没有被注意到，显而易见，讨论是不容易进一步深入的。

我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明这一点。这就是说，为了使中国近代史的科学研究工作有大的开展，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必须大力加强。这不是很明白的吗，只要我们从资料中概括地了解了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人民革命斗争的情况的话，我们自然不会只看到一点，以偏概全了。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还须改变某些同志一种看法。这些同志看不起搜集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以为这种工作吃力不讨好，他们只愿意根据别人所搜集和整理的资料来进行研究。还有个别的人则只根据一些现成的近人的著作和论文来加以概括，企图就这样建立自己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看法，成一家之言，而鄙弃深入研究原始资料的工作，以为这样会流于烦琐，陷于资料之中。照这些同志的想法，似乎搞“材料”、搞“观点”，在研究工作中好像应有所分工似的。以往社会上也曾有过一种重“观点”、轻“材料”的风气，无形中助长了这种倾向。然而无论如何，没有“材料”，是谈不上“观点”的。为了形成可靠的“观点”，必须要有充实的材料。每个研究近代史的人，必须自己深入原始资料。中国近代史的资料浩如烟海，如何对这些资料加以搜集和整理，是一个重大的工作，而照现在近代史研究的情况看来，这个工作显得特别重要。

我们希望，历史档案管理单位、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及其他有关机构把所藏的档案和珍贵的资料积极进行整理付印，公诸于世。有些不易再找到的资料希望加以重印（例如，刘坤一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集子“刘忠诚公遗集”用处很大，但是整个北京只有一部）。应该

〔下接80页〕